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经费资助

Harold Bloom
哈罗德·布鲁姆
诗学研究



翟乃海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经费资助
(项目批准号:13YJC752031)

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

翟乃海 著



NLIC2970909197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翟乃海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607-4842-9

- I. ①哈…
II. ①翟…
III. ①布鲁姆,H. —诗学—诗歌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9432 号

策划编辑:尹凤桐
责任编辑:尹凤桐
封面设计:张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泰安金彩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7.125 印张 209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摘 要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是美国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理论家之一。布鲁姆对西方诗歌批评和诗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他对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作家如莎士比亚,重新进行了解读;对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浪漫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首倡“影响误读”理论(influence-misreading theory),并不断补充完善。布鲁姆的学术影响也建立在数量惊人的学术著作上。截至2011年,布鲁姆共有近三十部著作问世,并为切尔西出版社西方文学经典系列五百部作品撰写序言,主编了多部诺顿文学选集。近二十年来,布鲁姆的每一部新作都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评论,如《J之书》、《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普通读者身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本文通过梳理布鲁姆历时五十余年的诗学思想,从整体上分析其成就与不足,对其进行总体上的评价。此外,通过研究哈罗德·布鲁姆的诗学思想,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方向。

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布鲁姆的生平和学术经历,并特别梳理了布鲁姆四个理论阶段的学术思想与成果。绪论部分还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中的基本概念,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思路以及创新之处作了说明。

第一章主要论述布鲁姆诗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背景与理论来源。首先,美国社会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剧烈变迁。政治

中的高压、社会中的沉闷、越战、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嬉皮士运动、少数族裔和女权主义者争取政治权利的政治斗争等等,都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境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生存和个人自由。这些成为布鲁姆诗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其次,布鲁姆诗学的形成有自身的理论背景。新批评理论雄霸英美文学三十余年,其方法越来越僵化和体系化,内在矛盾显露无遗,超越新批评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成为必然,布鲁姆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再次,从理论来源上看,布鲁姆吸收了弗莱和艾布拉姆斯对英国浪漫主义的观点;布鲁姆对同为耶鲁学派成员的德里达、德曼的解构理论主义和解构阅读观有所借鉴,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之感与防范心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布鲁姆诗学的重要来源,尼采的“强力意志”说、独创性观点、历史观及修辞理论,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家庭罗曼司”理论为布鲁姆诗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章重点探讨了布鲁姆的诗歌观。布鲁姆认为真正的、有价值的诗歌是强力诗歌,强力诗歌是伟大诗人想象力、创造、竞争意识的集中表现。布鲁姆从上述诗歌概念出发,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范围,把诗歌的概念延伸到其他体裁的文本中。例如,他认为文学批评与诗歌是同质的,都可纳入“诗歌”本身;此外,宗教文本、哲学、心理学等理论文本也是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性与竞争性的统一体。对于诗歌的性质,布鲁姆认为独创性、陌生性、崇高性和竞争性是诗歌的重要性质。陌生性就是诗歌的奇异性和独一无二性,即诗歌显现出的怪异之处,使读者对熟悉内容产生陌生感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展现的独特意识带给读者奇异之感,使读者进入一个异质的、宽广的精神世界,从而使读者思维空间和视野得到扩展并产生震惊和愉悦之感。崇高性也是诗歌的本质特征,即读者在诗歌中发现陌生、惊异之处,并在痛苦中产生精神愉悦的美学性质。竞争性也是诗歌的重要特性,诗歌中的新人与前辈竞争可以激发想象并创造出新的文学空间,可以为作者和读者都带来自由、愉悦等审美体验。布鲁姆以想象、虚构、陌生、崇高和竞争等特性为标准,扩展了文学的范围,消除了文学与理论、宗教和批评等界限,把它们都纳入诗歌的领域。最后,本章辨析了布鲁姆的影响论与互文性的异同。

第三章论述了布鲁姆的诗人观。布鲁姆赞同布莱克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世界观,与华兹华斯自然与真理融合的观念相悖。布鲁姆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不同,他认为自然并不是真理和美德的化身,真理世界也不是超越自然之外的世界。布鲁姆认为,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摒弃了世界与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诗人只有发挥创造性想象力,创造新的神话为混乱的、广袤的宇宙赋予形式和意义,才能预言真理的世界。同时,布鲁姆接受了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并与布莱克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结合起来,对其独特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布鲁姆反对现代、后现代主义对作者主体地位的消解。布鲁姆创造了“作为诗人的诗人”(poet as a poet)和“诗人内心中的诗人”(poet in a poet)等术语来说明其诗人观。布鲁姆认为,诗人就是作者的想象力与创作力,是作者的多层次的、复杂的创造意识,“诗人内心中的诗人”是传统天才观的继承与发展。布鲁姆以是否具有诗性自我为标准,把诗人分为强者诗人和弱者诗人。最后,布鲁姆反对后现代理论对作者自主性的消解,强调诗人是诗学中的重要维度。

第四章阐释布鲁姆诗学的批评观、方法论和批评实践。首先,诗歌批评是文学性和诗性的,与诗歌一样具有虚构性、创造性、修辞性和竞争性等性质。从功能上看,诗歌批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或文化的需要,而为了满足个体自我的成长,因此诗歌批评应该采用审美标准。其次,从诗歌意义论上说,布鲁姆认为诗歌的意义既非从文学外部产生,也非从文学封闭的作品自身产生。诗歌的意义在于两首诗和两个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批评家和读者在解读文本时,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强力意志”为作品赋予意义,有意误读或误释一首诗歌与其他诗歌的关系。再次,诗歌批评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对抗式的批评方法与误读法。最后,诗学理论中的各种原则和文学批评的范式、模型要经过具体文学作品的检验才能证明其适用性和正确性,布鲁姆诗学如英美许多文学理论一样,也是实证性的。布鲁姆诗学批评的对象涉及整个西方文学的诗人。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和莎士比亚批评是对误读法的具体应用。

第五章分析了布鲁姆的诗歌传统与文学史观。布鲁姆的文学史是“影响”的历史,遵循弗洛伊德“逆子弑父”式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布

鲁姆在历史观上与新历史主义针锋相对,他认为诗歌史只是“诗人内在意识的历史”和“心理变动的历史”,完全否认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外在的社会力量对塑造文学传统的作用。布鲁姆的诗歌史排除了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变成了一条条由作家之间相互影响、误读的各种的线索织就的网状关系史。同时,诗歌的历史也是诗歌努力为自己开拓想象空间,把自己的想象赋予其他诗歌的过程,所以布鲁姆认为诗歌都是浪漫主义文学史。诗歌史的叙述与经典化过程是一致的,文学史的书写必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虚构,是具有权威的个人或者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对作品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布鲁姆认为经典建构的历史就是诗歌误读史,是诗人不断尝试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建构的自我历史。本章最后比较了希利斯·米勒与布鲁姆文学史终结的观点。

第六章主要分析布鲁姆诗学的成就和局限。首先,本章对布鲁姆诗学性质的不同看法,如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激进还是保守、建构的还是本质主义的等问题作了辨析。其次,本章考察了布鲁姆诗学的贡献。第一,布鲁姆的诗学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从不同层次强调了个人的创造性,是对现当代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形形色色理论的反拨。第二,布鲁姆以审美为标准的诗歌批评方法有助于纠正当今文学批评中的泛政治性倾向。第三,布鲁姆的诗歌史是每个强大诗人自我成就的心灵史、影响史和误读史,这与传统文学的进化史观形成了对比,为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路径。再次,布鲁姆诗学的局限与不足也十分突出。布鲁姆认为布莱克诗歌中创造性想象或幻想才是诗歌的本质,通过预言未来获得人类的拯救。这一观点未免过于理想化,文学的救赎功能也未免过于沉重。布鲁姆认为竞争性、独创性和陌生性是诗歌的重要属性。如果以此为标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如艾略特、庞德、威廉姆斯,以及英国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都被排除出伟大诗人之列。一个文学作品不能与前人完全等同,简单的模仿的确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失,但是一个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与前人完全决裂,超越前人,取得绝对的独创性和陌生性。从诗人观上看,布鲁姆认为作者内心的深层自我或者潜在的诗性能力才是诗歌创造的源头,“诗人中的诗人”创作诗歌时不受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完全听从于自己

内心的召唤,这样必然会使一个人的诗性自我与人的社会属性分割开来。从批评的性质上看,把理论、批评与诗歌等同起来,就把非文学性文本中的想象、虚构等因素过度放大,抹杀了文学与批评等不同文类之间的区别,文学的含义就回到 19 世纪以前“文献”(literature)上来了,危及了文学学科的独立性。从文学史观上看,布鲁姆的文学史是封闭的,拒绝一切外部因素干预,而且其文学史观有总体化倾向。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布鲁姆诗学的背景和思想来源	(24)
第一节 布鲁姆诗学产生的历史与理论背景	(24)
第二节 布鲁姆诗学的思想来源	(38)
第二章 布鲁姆的诗歌观	(58)
第一节 诗歌的内涵与外延	(58)
第二节 诗歌的性质	(66)
第三节 诗性与互文性辨析	(74)
第三章 布鲁姆的诗人观	(80)
第一节 诗人与世界观	(80)
第二节 诗人内心中的诗人/作为诗人的诗人	(83)
第三节 强者诗人与弱者诗人	(87)
第四节 诗人/作者之死	(89)
第四章 布鲁姆的诗学批评观、方法论与实践	(93)
第一节 诗学批评观	(93)

第二节	诗歌意义论	(99)
第三节	诗歌批评方法论	(108)
第四节	诗学批评实践	(122)
第五章	布鲁姆的诗歌传统观与文学史观	(136)
第一节	诗歌传统观	(136)
第二节	布鲁姆的文学史观	(141)
第三节	文学史与文学经典化	(148)
第四节	布鲁姆文学史终结论	(161)
第六章	布鲁姆诗学的性质定位及评价	(169)
第一节	布鲁姆诗学的定位	(169)
第二节	布鲁姆诗学的理论贡献	(175)
第三节	布鲁姆诗学的局限	(181)
结语	布鲁姆与中国当代诗学	(191)
参考文献		(196)

绪 论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理论家之一。他与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等人在耶鲁大学共事，在学术上一度与德里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被人们戏称为耶鲁四人帮。他的影响力和声名与其说来自于耶鲁学派，不如说源于其理论的特立独行。他在20世纪70年代首倡“影响误读”理论，并不断补充完善，“影响的焦虑”、“误读”、“经典”等理论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被广为应用，成为不可或缺的术语。有学者指出：“他既著名又声名狼藉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在从《变音符号》(Diacritics)到《新共和》到《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等学术期刊中时隐时现，难以回避。”^①布鲁姆的声誉和影响也源于数量众多的著述，他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理论生涯中，出版了三十余部著作，并为切尔西出版社西方文学经典系列五百部作品撰写序言，主编了多部诺顿文学选集。近二十年来，布鲁姆的每一部新作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评论，如《J之书》、《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普通读者那里也产生了巨大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纽约时报书评》在评论布鲁姆的

^① David Fite, *Harold Bloom: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 Vision*,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 p. 4. 对布鲁姆诗学理论的两极评价，参见：David Fite, *Harold Bloom: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 Vision*,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5, pp. 4-5.

2011年新作《影响的解剖》时,不无敬意地说:“布鲁姆出身贫寒,但现在取得了对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说从未有过的声誉(almost unheard-of celebrity)”,颇有实现了“美国梦”的意味。

一、哈罗德·布鲁姆的生平与学术

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父亲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和母亲葆拉·勒夫(Paula Lev)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布鲁姆在《影响的解剖》中回忆其童年的家庭生活时写道:“我记得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拘谨的人,大萧条使他和其他制衣工人一样失了业,但1933年他在我3岁生日时买了玩具剪刀。当时我收到礼物时忧伤地哭了,现在写到这里也让我几欲泪流。”^①但他自小聪慧过人,记忆超群,酷爱读书,常跟随姐姐到当地图书馆借书。他11岁时读到了美国著名诗人哈特·克兰的诗,12~13岁时读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以后逐渐读到了麦尔维尔、莎士比亚、雪莱、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并且经过几十年后仍然能逐字逐句背诵诗歌。^②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在众多著述中引用这些作家的作品时完全凭记忆,从不标明出处,既体现了他反传统的写作风格,也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布鲁姆于1947年获得美国教育部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师从美国研究浪漫主义的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他在此期间表现优异,于1954~1955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Fellowship)在剑桥大学学习,仅用四年时间就获得博士学位,这在以要求异常严格而闻名的耶鲁大学是极为罕见的。自1955年起,他除短暂离开讲学或访问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他于1977年从耶鲁大学英文系转到耶鲁大学人文中心,现为耶鲁大学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Humanities)。布鲁姆于1958年和简·古德(Jeanne Gould)结婚,

^① Harold Bloom,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ondon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3.

^② Robert Moynihan, *A Recent Imagining*, Archon Book, 1986, pp. 3-4.

育有丹尼尔和大卫两子。

布鲁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但他的学术重点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历经了一系列变化。我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为重估浪漫主义时期。新批评在英美批评界盛行三十年之久,其代表人物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极力贬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受到质疑和批评,布鲁姆早期的著作就是在质疑和超越新批评的背景下问世的。《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幻想的伴侣》(1961)、《布莱克的启示》(1963)和论文集《塔内鸣钟人》(1971)等都是重估浪漫主义的著作,布鲁姆主编的《浪漫主义与意识》(1970)的论文集,集中了这一时期主要浪漫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布鲁姆极力赞扬布莱克和雪莱,认为他们诗歌中的神话、预言、幻想等因素重新为自然宇宙赋予形式,通过理想化的方式使人类获得了拯救。同时,他对华兹华斯人与自然融合统一的主张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观点消融了人的主体性。布鲁姆在《叶芝》(1970)一书中对叶芝的诗歌进行了重新评价。他断言叶芝并非现代主义诗人,而是浪漫主义诗人,叶芝早期受雪莱影响的诗歌要优于他后期的诗歌。《叶芝》一书论证了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对叶芝的影响和叶芝对这些影响的焦虑,为“影响—误读”理论阶段的到来作了准备。

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误读”阶段。布鲁姆在这一时期重新界定了文学理论中的古老概念“影响”。布鲁姆认为:“影响”对于志在取得成就的诗人和作家是一种负担,而非一笔丰富的遗产和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诗歌中的新人因为总是出生在一个漫长的文学传统中,文学中的想象空间都被前辈利用殆尽,他们为摆脱迟来之感(belatedness),建立自己的身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就需要重演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司”,通过复杂的修正过程误读前辈诗人,杀死自己的文学父辈而成就自我。这是《影响的焦虑》(1973)与《误读之图》(1975)的中心论点。《卡巴拉与批评》(1975)、《诗歌与压抑》(1976)、《竞争——走向一种修正主义理论》(1982)等著作在其“影响—误读”理论中加入了犹太教密宗卡巴拉与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的思维方

法。《华莱士·史蒂文斯》(1977)把“影响—误读”理论应用到美国文学中。《能够想象的人物》(1976)、论文集《破碎的容器》(1982)、《影响诗学》(1988)和不太成功的小说《飞向路西弗》(1979)都是“影响—误读”理论的发展和实际应用。《批评与解构》(1979)是布鲁姆编辑的论文集,包含耶鲁学派主要人物德里达、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特曼等人的论文。

最后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大众阅读批评阶段”。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直延伸到现在。布鲁姆在这一阶段逐渐放弃了前期晦涩难懂的术语,为受过一定教育的普通读者而非专业的批评家而写作。这一时期的著作包括把宗教文本作为文学作品解读的《J之书》(1990)、《美国宗教》(1992)、《千禧年的预兆》(1996)、《耶稣和亚卫》(2005)等,也包括文学经典的解读,如《毁灭神圣的真理》(1989)、《西方正典》(1994)、《莎士比亚——人的创造》(1998)、《如何读、为什么读》(2000)、《所有时代聪明的孩子要读的故事和诗歌》(2001)、《天才》(2002)、《哈姆雷特——无尽的诗》(2003)、《智慧何处寻》(2004)、《影响的解剖》(2011)等。

布鲁姆的学术生涯十分漫长,在不同时期他关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独立的、个人主义的、反主流的对抗姿态。布鲁姆的盛名与其独特的个性魅力是分不开的。他旗帜鲜明反传统的姿态使其与文学批评圈中刻板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特立独行的姿态在其著述中一览无余。例如,他的论文与著作不标明出处,不使用注释,引用完全依靠记忆;他写作往往是即兴而为,不管在聚会中、在餐桌上,还是噩梦后醒来要依赖一时的灵感。据说,《幻想的伴侣》是在餐桌上写成的,其代表作《影响的焦虑》就是噩梦后用一天半写成的。如今电脑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布鲁姆仍然坚持手写书稿,并拒绝编辑在出版时作任何修改。在学术上,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新批评派争吵,70年代与德里达争吵,80~90年代与后殖民主义、女性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政治性批评流派争吵,而进入21世纪来又和以“哈利·波特”、史蒂芬·金为代表的大众通俗文学争吵。这些激烈的对抗姿态是他独具特色的、原创的诗歌理论的写照,贯

穿于数量众多的理论著作中。

布鲁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获得了广泛认可。他1956年获得约翰·艾迪逊·波特奖(John Addison Porter Award),1962年获得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1967年获牛顿·阿尔文奖(Newton Arvin Award),1970年获颁麦尔维尔·凯恩奖(Melville Cane Award),1981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颁发的莫顿·多温·赞布尔奖(Morton Dauwen Zabel Award),1985年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奖(MacArthur Foundation Award),1988年获克里斯蒂安·古阿斯奖(Christian Guass Award),2002年获得第十四届加泰罗尼亚国际奖(14th Catalonia International Prize),2003年获得墨西哥阿尔方索·雷耶斯奖(Alfonso Reyes Prize)。他的《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书多次被评为《纽约时报》最佳图书,并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被译为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日语和汉语等多种语言。

二、文献综述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布鲁姆对卷帙浩繁的西方文学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学术界对其诗学和实践进行了较多分析和评价,尤其对如何界定布鲁姆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众说纷纭,因此详细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布鲁姆诗学和实践的介绍、分析评价可以更好地找到解读布鲁姆的新角度。

(一)国外研究现状

哈罗德·布鲁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续出版重估浪漫主义“三部曲”——《雪莱的神话创造》、《幻想的伴侣》、《布莱克的启示》以来,已经奠定了自己作为重要批评家的地位。英美批评界对其研究时间上较早,研究成果形式也较为多样。

首先,英美批评界对布鲁姆的每一部著作都有众多评论,此类书评数量众多,除总结和介绍新书内容外,多以批评的态度评论和阐释布鲁姆的著作。如艾伦·格罗斯曼和J.R.马来恩在评论《叶芝》一书时,分别总结了此书中的要点,指出这本著作是布鲁姆转向影响诗学的转折

之作。保罗·德曼于1974年对《影响的焦虑》的评论极为深刻。德曼总结了《影响的焦虑》中的主要内容,进而指出布鲁姆的六种修正比可以与修辞手法结合起来,如苔瑟拉对应提喻,阿波弗里达斯对应比喻的比喻,阿斯克西斯对应隐喻,魔鬼化对应夸张,克诺西斯对应隐喻一转喻。文本中的意义就是六种误读方式的相互关系,六种修辞方式解构了文本中的主题。^① 德曼的这一观点虽然有把自己的修辞阅读理论投射到布鲁姆作品的嫌疑,但是极大地启发了布鲁姆。他在接下来的《误读之图》中采纳了德曼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包含修辞手法、心理防御、诗歌意象和修正比等要素的复杂图示。丹尼尔·奥哈拉评论《竞争——走向修正主义理论》时,追溯了“误读四部曲”中的主要观点,并着重指出布鲁姆对弗洛伊德的分析是这部著作的重点。对《西方正典》一书的评论可谓众声喧哗,史蒂芬·赫姆林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性崇高》、大卫·杜雷的《布鲁姆和经典》与丹尼尔·希尔沃的《西方正典书评》对布鲁姆的经典作品选择标准、具体作品入选,尤其是对书后的经典名单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一些当代作家并不具备入选经典的资格,并批评布鲁姆选择经典的标准过于随意。《黑人高等教育期刊》论及《西方正典》时说^②,布鲁姆把整个文学历史划为“神的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四个时代,在这几个时代中很难见到黑人作家入选。在民主时代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入选,而纳特·特纳、查尔斯·柴斯那特、杜波依斯等黑人作家的优秀作品无缘忝列经典。布鲁姆认为,混乱时代中詹姆斯·鲍德温、拉尔夫·埃里森、兰斯顿·休斯、托尼·莫里森、佐拉·尼尔·赫斯顿、理查德·赖特等作家仅有将来进入经典的可能。作者对布鲁姆以白人男性和欧洲文化作为经典标准颇不以为然。布鲁姆的宗教研究著作引起了激烈批评与反对,罗伯特·奥特在《布鲁姆的“J”》一文中总结了此书的主要观点,

^① Paul de Man,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Book Revi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6 (1974), pp. 274-275.

^② Black Writers and Harold Bloom's Literary Canon,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No 6, Winter 1994-1995, pp. 24-25.

但批评布鲁姆未仔细阅读《希伯来圣经》原典，而仅仅依赖罗森堡的英语译本作出判断。罗森堡的译文存在很多明显错误，布鲁姆许多重要结论是从这些错误译文中得出的，因此十分不可信。理查德·纽豪斯在评论《美国宗教》一书指出，布鲁姆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并非基督教而是诺斯替主义，这一观点是误读和胡说。而斯图亚特·吉尔斯基则认为，布鲁姆并非严肃的宗教学者，他仅仅把《圣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

其次，对布鲁姆的阶段性和专题性研究。南奈特·奥特沃斯重新梳理了布鲁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重要著作，宣称布鲁姆的影响理论是建立在早期浪漫主义研究之上的，“自由的自我”是布鲁姆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建立在自我能够超越历史语境的渴望或可能性之上，通过新的幻想或自由的自我，制度化形式的要求转变为自我的要求”。因此，她提出“布鲁姆的诗歌依赖的传统神话模式是浪漫主义的循环模式”，并以此重估了布鲁姆中早期的理论著作，认为布鲁姆的修正理论是“一种心理的传记，讲述的是诗人自我心灵的成长史”。^① 成长的历史包括“天堂”、“失去的天堂”、“复得的天堂”三部曲。

拉曼·塞尔登在《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中把哈罗德布鲁姆归类到“传统与互文性”这一主题下。塞尔登在简短概括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和《误读之图》中提出的影响诗学和误读理论后，说：“布鲁姆的这种有些别具一格的理论似乎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有密切关系：德里达福柯等人都认为所有对文本进行的敏锐的批评阅读都是误读，它们忽视颠覆每一次阅读的无所不在的指意的‘游戏’。”^② 塞尔登看到了布鲁姆与德里达等人在“误读”上的相似性，对布鲁姆的理论 with 互文性之间的关系心存疑虑，没有直接把影响误读理论和互文性等

^① Nanette Alteviers, "The Revisionary Company: Harold Bloom's 'Last Romant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2, p. 363.

^② [英]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8~409 页。